

回憶孫中山和廖仲愷

何真滌



回憶孫中山和廖仲愷

(修訂本)

何香凝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63年·北京

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愷

(修訂本)

何香凝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787×1092 1/32 1 1/4印張 1插頁 43,000字

1957年8月北京第1版 1963年4月北京第2版

1963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25,001—37,000 定价(6)0.22元



后排左起第二人为廖仲愷，前排右起第三人为何香凝，第四人为孙中山，第五人为宋庆龄，第七人为廖梦醒。

孙中山前面的为廖承志。

回忆孙中山先生

1902年的冬天，在仲愷东渡日本两个月以后，我也到日本去留学。

当时，孙中山先生宣传推翻清朝、号召革命的名声，在日本留学生中早已传播开了。我们十分仰慕，可惜的是还没有会面的机会。190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廖仲愷到神田神保町的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留学生的聚会，在会场上初次看见了知名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真是喜出望外。但是，当时留日学生的思想十分分歧，参加那次会议的有革命青年，有保皇党，也有清政府的暗探和忠实走狗，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孙先生在那次聚会上谈得并不多，只泛泛地谈到了中国积弱太甚了，应该发愤图强，彻底革命。我们都听得入了神，不知不觉就到了散会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偶然的时机，打听到孙先生寓所的地址，预备以后再去拜访，听他多谈些革命道理。

几天以后，我和仲愷，还有另一个留日青年学生黎仲实，三个人一起按地址到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拜访孙先生。在

一个面积不大、陈設簡朴的小房間里，孙先生亲切地接見了我們。正像一般年青人之間的会面一样，我們沒有客套，話題馬上从中国政治問題上开始了。这一次孙先生談得很多，从鴉片战争談到太平天国，談到戊戌政变，談到义和团，談到清政府腐敗无能，所以一定要进行反清革命。我們听他說到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道理，十分佩服，十分贊成。后来，我和仲愷又再到那“下宿屋”去見孙先生两次，对他表示我們也想参加革命工作，願效微力。孙先生指示我們先在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結交。此后，我們积极参加“革命同盟”的各项活动，在留日同学中展开广泛接触，进行聯絡宣传工作。

1903年夏秋之間，孙中山先生离日本經檀香山赴美洲宣传革命去了。孙先生一向都是十分重視武装斗争的，他接受了在兴中会、华兴会时期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訓，十分注意訓練軍事人材。他在离开日本之前交給我們一个任务，叫我們組織留日学生学习手枪、步枪射击等等初步的軍事知識，为将来发动武装斗争作准备。那时我和仲愷已由寄宿舍迁出，在牛込区租賃房子居住。仲愷、黎仲实和苏曼殊等人便組織了住在牛込区的留日青年学生，成立义勇队。为了避免外人知道，义勇队員每天清早秘密集合到大森練習射击。黄兴懂得軍事知識，由他給义勇队教授枪法。与我們居住在同一个寓所里的义勇队員約有二十多人，我每天都先行起床，为他們照料家务。清政府駐日公使館一向对我們的聚会极为注意，并且勾結了日本警察，經常偵查我們的行动。义勇队的青年都很热心学习軍事，練習射击的事也很秘密，本来我們是可以繼續練

习下去的。但是由于其中一个队员谈恋爱出了问题，被敌人找到了破坏的机会。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和我们同住的青年义勇队员和日本“女中”（即女服务员）闹恋爱，日本警察指使那个日本“女中”假装怀孕，到我们寓所来吵闹。我们只好变卖家私杂物，筹钱赔给那个“女中”，并且搬了一次家，搬到小石川居住。在牛込区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义勇队练习射击的事，因此无形中等于停止了。

1904年初，孙先生作环球旅行，由美洲经日本前赴欧洲考察。他到日本之时，我正怀着身孕，预备回香港分娩。孙先生特意叫我带一封信给在香港的陈少白，我因此才与陈少白认识。我由东京先到横滨候船回国，知道孙先生当时在横滨山下町已设有秘密的通信联络的地点。我在香港生下了梦醒，将她留在娘家托人抚养，独自又回到日本留学。

本来，在兴中会和同盟会时期，很多日本朋友都曾热心帮助孙先生进行革命工作。山田良政在第一次惠州之役被清政府逮捕，后来牺牲了。此外，宫崎寅藏兄弟、犬养毅、菊池、萱野长知、寺尾亨和山田纯三郎等人也曾尽力帮助过孙先生。我们至今仍纪念着他们。原来日本政府的对外方针是根据日英同盟的政策办事，而英国是大力支持清朝的，因而日本政府当局与清政府互相勾结，对于中国革命党人在日本进行的活动，多方设法制止和阻挠。所以不少日本朋友帮助我们一个时期，另一个时期又不敢同我们多所来往，就是受了日本政府的限制。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在日本进行工作，也是相当困难的。

1905年孙先生由欧洲回到日本，积极筹备組織同盟会的工作。他的活动范围更广泛了，方式更多样了。他这次在东京一間名叫“高阳館”的旅店居住。那些一貫与清政府相勾結、向来对于孙先生的行动深为注意的日本警察，又常常看見孙先生收发很多書信，会見很多客人，聚众宣传，高談闊論，当然把孙先生的革命活动完全报告上去。孙先生的行动因此經常受到干涉。孙先生为了以后能够繼續順利地多做些革命工作，想找一个可靠的人，借他的寓所作为开会及收信地点，以便掩护。因为我和仲愷参加“革命同盟”的活动已經不少日子，而我們夫妇又是自己租賃房子居住，孙先生觉得在我家开会及收信极为合适，就叫黎仲实来找我談。黎仲实轉达了孙先生这个意思，我十分贊成，孙先生还特別提到严守秘密的重要，希望我不要雇用日本“女中”。我都一一答应了。为了保守秘密，我还特意去找一間合适的房子。几天以后，搬了一次家，由本乡搬到神田，連“女中”也沒有雇，每天下課以后亲自操持家务。我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会烧飯等等家务劳动的。自此以后，我家就成为通訊聯絡站和集会場所。

那时，酝酿正式成立同盟会的工作已經相当就緒。而仲愷因回香港筹借留学費用，不在日本。在孙先生叫黎仲实来和我談借房子开会的第二天晚上，我在我的寓所里办了入盟手續。那时盟員中还没有女的，我就是第一个女盟員。入盟的手續，本来要两个人介紹。我填的入盟書，只有黎仲实一个人的签名，后来孙先生看了，他也签了个名字。我清楚地記得我举着右手，在孙先生的领导下讀了“驅除韃虏，恢复中华，

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有始有終，如或渝此，任眾處罰”的誓言。我雖然早已參加了“革命同盟”的活動，並且早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句口號作為我革命奮鬥的目標，但是現在我又正式辦理入盟手續了，再想到我們獻身的革命事業有了越來越多的人擁護，勢必越來越加快發展，我當晚興奮激動得徹夜未眠。和我同時辦理入盟手續的還有馬君武、以及日後刺殺仲愷的真凶胡毅生等人，這就是孫先生在日本發展的第一批同盟會會員。我們這幾個人和稍後入盟的仲愷、朱執信，後來都成為中國同盟會的骨幹。

我搬到神田居住以後，孫先生每星期召集同志在我家裏開會兩三次，經常在我家計議和籌劃各種革命工作。按照日本規矩，進門就要脫鞋，人如果來得多了，都脫下鞋子，很多鞋子堆在門口，是會引起日本警察和清政府的走狗偵探懷疑的。因此，當孫先生每次開會的時候，我除了做好看門、照料茶水的工作以外，還專門做收藏鞋子的工作。孫先生收發信件也很多，有時還用假名。寄來郵件中有寫“中山”、“高野”、“逸仙”、“孫宅”收的書信，我都收妥，交給孫先生。

由於孫先生的正確領導和同志們的積極努力，1905年7月，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正式成立，決定將來成立的新國家稱“中華民國”。當時入盟者已有數百人，盟員籍貫遍及中國十七省。只有甘肅因為還沒有留學生到日本，所以還沒有甘肅省籍的盟員。及後不到年餘，入盟的已過萬人，國內各省都成立支部，從此革命風潮，日甚一日。

在我入盟以後大約兩個多月，仲愷方才回到東京。同船

抵达的还有胡汉民夫妇，胡汉民夫妇寄寓在我的家里。

那天孙先生和黎仲实刚好到我家里来，所以大家会面。晚饭后，休息了一下，孙先生、黎仲实和仲愷谈及同盟会的组织和主义，仲愷有志革命很早，他当然十分赞同。随即办理宣誓入盟手续，介绍人是黎仲实和我。但是，胡汉民为了“平均地权”四个字与孙先生展开了辩论。胡汉民认为不宜于在那个时候提出“平均地权”的口号。我记得那天夜里我在床上醒了再睡，睡了又醒，还听见他们在隔壁房间争论不休。黎仲实有事先走了。我见夜已深沉，还特意起来替孙先生预备被褥，一并请孙先生留宿。当时孙先生详细地向胡汉民讲解说：“你参加反清朝帝制，这很好。但是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我们革命的目的之一。而要解决民生问题，首先就要平均地权。”他们二人反复争辩到深夜三时，胡汉民才入盟。所以胡汉民后来不同意改组国民党，不同意实行三大政策，是早有原因的。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同盟会的口号，它初步概括地体现了孙先生当时的革命理想。这四句口号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也不应该分割。那个时候虽是革命浪潮汹涌，有志青年纷纷趋向革命，同盟会发展迅速，固然出人意表，但是每一个加入同盟会的人，在入盟时都要宣读这四句誓言，把这四句话作为服膺奋斗的南针。可惜的是在全体同盟会员之中，只有一部分的同盟会员对这四句口号是真心拥护到底的，有一部分同盟会员仅仅在表面上接受，实际上心里面是不接受，或者并不是完全接受的。所以后来革命阵线内部一再发生分歧，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预伏远因了。

自从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以后，清朝政府发觉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活跃非常，于是加紧勾结日本当局，設法制止留日学生革命思想的蔓延。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发布《取締清韓留日学生規則》，清廷駐日公使汪大燮是从中做过相当工夫的。取締規則中規定取締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剝夺言論自由，禁止集会結社，检查書信，强迫青年遵守清朝法令，以鎮压革命思想。当时留日学生分为两派：一派胆小怕事，主张妥协；一派主张坚决反抗。这次“反对取締規則”的斗争，也无例外地考驗了我們留学日本的每一个同盟会会员。我和仲愷，还有很大一部分同盟会会员都坚决主张同盟罢課，以示抵抗。我們在斗争中团结广大青年学生，激发他們的爱国热情。很多青年学生就在这次斗争中受到启发和教育，由靠攏我們进而直接参加到同盟会的組織中来。中国同盟会的活动，不但沒有因此而受到打击，反而更加活跃发展。但是，也有一部分同盟会会员在这次斗争中暴露了他們的本性。即如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当时都还没有考入正規大学，只是混在政法学校的速成班里学习，恐怕罢課对他們不利，恐怕拿不了清朝的官費，恐怕会被学校开除，为自身計，他們是主张妥协不罢課的。汪精卫还在当时的所謂“維持会”上签过名。当然，要說全体留日的中国学生都罢学回国，不特实行起来頗有困难，而且大批同盟会会员回国之后也有被清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險。孙先生不贊成留日学生全体回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那时的斗争中，革命党人主要的是應該和大家团结一致，共同行动，坚持斗争，爭取胜利，而汪精卫与胡汉民恰恰就是根本沒有这

样的信心和决心的。

1905年10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投稿的多为同盟会会员,他们写宣传革命的文章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当时发表在《民报》上的文章,也明显地反映了同盟会会员内部存在的思想分歧。这些文章可以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人的文章仅仅反映推翻清朝的单纯民族主义思想,至于推翻清朝以后中国往何处去,思想上还是完全模糊的,甚至还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这一类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等。第二类人的文章则指出在推翻清朝以后,要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欧洲或日本式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代表人物就是胡汉民、汪精卫,后来成为西山会议派的邹鲁、居正也是属于这一类人物。第三类人则接受了当时已经在日本青年学生中开始流行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并试着把那种尽管还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来。他们在翻译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时候,把资产阶级译作“豪富”,把无产阶级译作“细民”,他们在《民报》上宣传“细民”与“豪富”的斗争,也就是宣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一类的代表人物就是朱执信和廖仲恺(仲恺用笔名“屠富”)。当时中国同盟会存在的这三类思想都在《民报》的文章上反映出来。中国究竟往何处去?问题是提出来了,也有过争论,可是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得到解决,而彼此的见解也极不一致。辛亥10月武昌起义成功,清朝皇帝就退位了。辛亥革命是没有明确的思想准备作为基础的。当时武装斗争是抓得紧,而思想建设就比较松了。后来的历史可以充分证明:第一类人

和第二类人中的一部分在刚刚推翻清朝、袁世凱上台的时候，就完全倒过去了。第二类人中的另一部分在改組中国国民党的时候，也完全暴露了他們的反动本質。而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不幸在 1925 年因病去世。朱执信又已牺牲。自始至终一心一意跟随孙先生，忠心耿耿地想把中国建設成为比較进步的，自由、平等、独立、富强的国家的国民党人，便只剩了廖仲愷等少数人，仲愷后来又被往日的老朋友、国民党中的反革命分子暗杀牺牲。政权落入了蔣介石、汪精卫等投降帝国主义的反动派手中，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的胜利推迟了二十多年。

同盟会正式成立大約一年之后，我們遵照孙先生的指示，宣传反对保皇党，并与当时的改良主义者及君主立宪派展开激烈的斗争。当时，保皇党害怕革命，他們提出“革命会招致列强瓜分中国”的論調。孙先生对此极为憤慨，就口述意思，叫人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除彻底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别无出路。革命絕不会招致列强瓜分中国”，严詞駁斥了保皇党的反动論調，得到当时有志青年的拥护。孙先生还叫我和仲愷、朱执信等联名写信給海外美洲等地华侨，向他們宣传推翻清朝帝制的必要，深得海外华侨同情。不久也有华侨加入同盟会，并寄了款来，贊助革命。

記得孙先生有一次赴欧途中，在船上結識了在法国巴黎开古董店的华侨张靜江。正像很多华侨一样，张靜江也十分同情反清革命。分別之时，他与孙先生約好，“以后革命事业如果需要款項，可以随时打电报給我，不过，这些事进行要秘

密，款項不用写明数目，只写 ABCDE 就可以代替一万、二万、三万、四万、五万了。”当时，孙先生对这个表示是半信半疑的。但是回来之后，有一次急需用款，就叫仲愷打电报到法国給张靜江等华侨。当时还不敢存奢望，只写了一个 B 字，法国华侨就立刻汇了五万元回来，对革命事业帮助很大。对于革命，华侨不但出了不少錢，还出了力。华侨亲自回来参加革命起义的就不少。行刺清朝孚岐^①的著名的溫生才烈士就是华侨。

在同盟会成立之后，我也結識了秋瑾。她是一个不事裝飾的女子，为人豪爽热情。我是广东人，那个时候还不懂普通話。我和他們那些外省籍的同志都是用笔談的。但我們同样都是青年人，有共同的理想和志願——推翻清廷，建立富强繁荣的祖国的理想和志願，我們不难找到共通的心声。語言的隔膜，並沒有妨碍我們成为投契的朋友。除此之外，还有后来在 3 月 29 日广州之役牺牲的七十二烈士之一——日本千叶医学专科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方声洞，也是在这个时候与我結識的。

这一段时期，我一面学习美术，一面繼續为孙先生照料秘密集会和通訊联络机关。为了筹划革命党人的起义事宜，很多准备工作都是在我家里部署的。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有一些就是我在孙先生的指导下描繪和刺綉縫制的。

我就是这样在孙先生领导之下，为革命做了些瑣碎的事务工作。凡是孙先生吩咐我做的工作，凡是有益于革命的工作，我从不推辞。我觉得我既已献身革命，就应该乐于完成交

^① 孚岐——清政府广州將軍。1911 年 4 月 8 日，被溫生才击毙。

給我的任何任务。我在留学日本而又进行革命工作的整个期間，生活都比較俭朴清苦，娘家給我的錢統統都給我花用在这上面了。为了准备起义，孙先生要派同志回香港購运軍火，我們大家都帮忙筹措旅費。我这样做，还完全不敢告訴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及亲戚，因为当时革命叫做“造反”，被清政府知道，是会株連九族的。

1910年至1911年間，国内几次武装起义失敗，革命轉入低潮。有一些革命同志因为急于推翻清政府，采取了暗杀行动。除溫生才刺孚岐之外，还有李沛基炸凤山^①。至于1910年謀炸摄政王，則主要應該归功于喻云紀和黄复生。一切部署准备的主要工作，都不是汪精卫做的。汪精卫之所以参加謀炸摄政王，也不过是在当时革命困难日增的情况下，由于失望而鋌而走险的拚命行动。当时这一些行动孙先生都不贊同。汪精卫行刺摄政王不果被囚之后，孙先生就說過：“我們革命党人做革命工作，應該光明磊落，不用暗杀。”

为了积极筹划再行发动武装起义，孙先生一方面派人到香港，另一方面又亲到南洋各地筹款支持革命。1911年春，我已在本乡女子美术学校毕业，也回到香港娘家居住。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之前，香港就是革命党人的联络接头地点。我虽然沒有亲身参与这次战役，但是这次起义的准备事宜，我都有些預聞。这次起义是孙先生指示黄兴领导进行的。朱执信也参加了。牺牲的七十二烈士都是我們同盟会的优秀

^① 凤山——清政府广州將軍。1911年秋天，被李沛基炸死。

同志，都是当时革命的中坚分子，方声洞、林时爽等就是留学日本的有为青年，还有几个南洋华侨。这次震动中外的“黄花崗之役”虽然失败了，却激励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动摇了清朝統治的基础。

二

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孙先生正在海外宣传革命，募集革命基金，其他革命党人也很分散，革命缺乏一个統一的领导。軍閥、官僚、政客、立宪党人乘机夺取革命果实，許多宣布独立省份的軍政大权都落入他們的手中，政权由封建帝王轉入地主、軍閥、买办资产阶级的手里。孙先生12月从海外回到上海，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而同盟会自根据宋教仁的提議改組为国民党后，軍閥、官僚、买办、地主、土豪劣紳都参加进来，其中有不少人根本就反对孙先生的革命主张，甚至有的手上还沾滿了革命烈士的鮮血。这些人加入国民党完全是一种政治投机，目的不外想鑽进来升官发财，根本談不上实现同盟会的革命思想，更談不上采取各項革命措施了。这样，国民党就漸漸失去了他的革命性。当时有国民党中的极右派分子劝孙先生：“中国弱，不宜于过激地反对列强，中国穷，也不宜于过激地反对資本家。”孙先生听了这些謬論很憤慨，在一次演說中駁斥他們說：“如果我不反对列强，我就不用这样辛苦革命了。”又感慨叹息說：“現在国民党人，多已丧失革命銳气，一味只知貪图富貴荣华，今后恐难有大作为。”

我所認識的孫中山先生就是這樣的，而且他的確曾想避免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

這時候，袁世凱憑借他的地位和武力，已經做了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進攻革命的新工具，並且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向革命發動了進攻。袁世凱一面指揮軍隊攻擊革命軍，另一方面試探議和，甚至偽裝他也同情革命。袁世凱的這種反革命的两手，對當時革命內部的許多人發生了很大的威脅和欺騙作用。甚至不少人被袁世凱所收買，成為他在革命內部的坐探和代理人。孫先生是十分反對和議的，他認為“革命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孫先生提到的所謂反對列強就有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意思，平均地權就是削弱封建主義的基礎，節制資本就是想避免使中國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這些愛國而又比較急進的民主主義思想，當然不是當時國民黨內外的封建買辦分子所能接受的，而一些對帝國主義還存在着敬畏心理和抱有幻想的分子，當然也不會真正贊成這些主張。封建、買辦勢力特意製造出一種“非袁莫屬”的論調來打擊孫先生，帝國主義者更以實際行動來支持袁世凱。在國民黨內占優勢的右派分子都一致主張把臨時大總統讓給袁世凱，而往日同盟會員中也出現了為袁世凱說話的人，汪精衛就是其中的一個。汪精衛行刺攝政王被捕而沒有被殺，袁世凱就曾經在當中做過一些文章；所以汪精衛被釋放后立即主張“南北議和”，堅持讓位給袁世凱。袁世凱當了大總統之後，汪精衛便得到袁世凱的津貼，到了法國。事後孫先生寫過一封信，內中談及汪精衛，說“此人軟弱無能，不可重用”。